

城市语境中的

民俗保护

当代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

蔡丰明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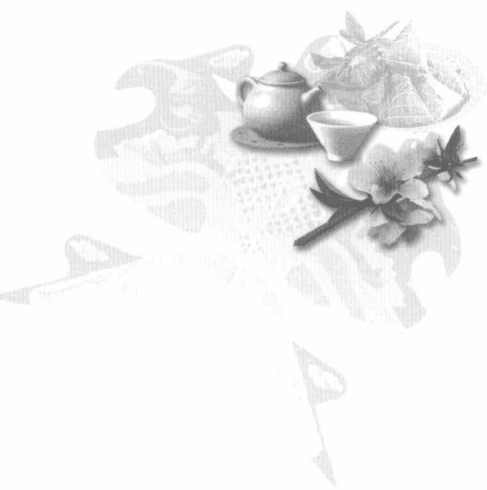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城市语境中的

民俗保护

当代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

蔡丰明·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当代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蔡丰明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ISBN 978-7-80745-614-8

I. ①城… II. ①蔡… III. ①风俗习惯—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上海市 IV. ①K892.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5035 号

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

——当代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

著 者:蔡丰明

特约编辑:明 周 林 笛

责任编辑:汝 东

封面设计:王 令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8.375

插 页:2

字 数:21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614-8/K·094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得到了世界许多国政府的认同和响应。据 2008 年 3 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二次缔约国大会公布的数字,缔约国已达到了 95 个之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成为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影响最大的世界性文化思潮之一。

在我国,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特别是上亿农民进城务工,这种千古未见的大移民,既改变着农村和城市人口的结构,同时也正在改变着他们的身份,促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移动和嬗变。原本以原始狩猎、游牧和农耕文明为土壤的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赖以生存的土壤——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得十分脆弱或衰微,使其传承和延续遭遇了困境。

中国政府自 2003 年启动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来,把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纳入了政府体制和国家战略,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针下,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且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里过去从来没有遇到的一些新的现实问题和新的理论问题,一下子都涌到了我们的眼前,要求理论学术工作者们走出“象牙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回答。而现代化大都市和乡村这两个不同场域里的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形态、特点、遭遇、未来命运以及不同的保护方式,就是这诸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中

的一个。蔡丰明先生的新著《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当代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所选择研究的,就是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和研究中的一个备受关注的前沿课题。

我国历来以农业立国,自给自足的耕稼方式延续了几千年之久,宗法家族制度和人伦观念根深蒂固,这些社会条件,是滋生、养育并持续影响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演变的两大根源。如今,时间把中国推到了向现代化转型的新时代。现代化的进程改变了以口传心授为其传承方式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延续的命运。尤其是在一些现代化发展较快、文明程度较高、外来文化影响较大的大都市,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近二十年来,其现代化的速度是惊人的,现代化不仅改变了市民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城市面貌、人际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市民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标志,也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价值观(包括社会发展观、人生观、信仰观、人伦观、审美观等)的变化,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面貌、特点、形态、命运和发展方向。

在文化形态上,中国的城市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难解难分的血肉联系,尽管这些城市有着几千年、几百年不等的建城史和现代都市发展史,而独特的文化又是一座城市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但一座城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面貌和特点,既决定于中国的久远而牢固的文化传统,又决定于它的“五方杂处”的人口组成。这些大都市的文化,看来不外三个来源:一、来自文化精英们所传的精英文化,即所谓“大传统”文化;二、来自下层民众所传的民间文化,即所谓“小传统”文化;三、来自外来文化(包括异族文化)。比较而言,大都市的文化与农村的文化相比,上层精英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大,而农村的文化,则主要是民众传承的民间文化,而且植根牢固,上层文化(如儒家文化)的传播相对来说是有

限的。城市文化的这三种来源和因素在不同城市的文化的形成上,又是各自不同、各有千秋的。譬如,北京作为古老的帝都城市,在其传统文化中,上层文化(尤其是宫廷文化)的影响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浸润,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和构成中尤甚,这一点,在近几年来城区和近郊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和保护项目的评审、报刊媒体的报道和相关的学术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而上海这样的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大都市,自开埠 200 多年来,始终呈现出开放性的品格,始则受到“西学东渐”思潮的促动,继而受到现代都市文明的影响,工业和商业发达,造就了大批产业工人,表现在文化上有着与北京这样的古帝都城市迥然不同的特点。一座城市的城区与郊区,特别是远郊区,其文化也往往呈现出很不相同的特点和面貌。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有的郊区的文化,与城区的文化相比,甚至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上海市的市区和郊县之间,这种差异显然也是存在的。纺织业是作为工业基地的上海多年来的重要产业,以祖师黄道婆为代表的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以及有关她的事迹和传说,出在旧日的小城镇松江、今之城区的徐汇区,今天的社会环境已不可同日而语;而作为远郊的南汇的哭嫁歌,尽管今天还在流传,但以笔者所见,就其所包含的深层民俗文化内涵而言,也许很难将其归入作为上海传统文化核心的吴文化的版图之内,更多的可能,是在渊源上曾经是滩涂地带的一种古老移民文化的遗存。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得之见。同样,北京远郊平谷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表现出来的特点,笔者也曾发表过这样远未成熟的意见,认为可能并不一定属于老北京(燕)文化圈的文化,而更有可能是古代某少数民族文化或某种外来移民族群或群体的文化的遗留。当然这也是笔者的一得之见,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验证。总之,这些都市边缘地区的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少受到近代文明的浸染,无论在内容上、形态上、特点上、气质上,都较多地保留着原生形态的文化

品格,都是与作为城市核心区的城区的文化有显著区别的。乡村的,特别是远离城市文明的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普遍的,也是最重要的特点是,多多少少保留着,甚至离不开与民众信仰的紧密关联,即使一些以物质为依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只要细心考察和深入研究,也总可以发现和寻找到这种联系的蛛丝马迹来。而大都市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数已经脱离了民众信仰的附着与制约,特别是那些容易向商品属性靠拢和进入商品流通的手工艺,大多数向着个性化、精致化、艺术化的商品方向发展,蜕变为完全世俗化的、欣赏化的文化,其中一部分进入了当代通俗文化(如庙会上的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的行列,部分属于高雅、高贵、贵重,只为少数富人瞩目,收藏家购买和收藏的文化(如玉雕、漆雕、牙雕等),后者甚至大可堂堂正正地归入所谓“大传统”文化之列了。

前辈学者钟敬文先生生前曾指出过,民俗学应该是一门现代学。但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是,民俗学从来没有真正地走出书斋,走出历史学,既不能增强与其他相邻学科对话的能力,又没有树立起为国家需要服务的国情观念。近年来,蔡丰明走出了书斋,参与到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行列中去,亲自考察和研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若干项目在这个大都市里的渊源和历史、现状和未来。他从“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以上海这个我国最大的现代化工商业城市里的传统民间文化及其演变为对象,对其在现代化语境下所遭遇,保护工作中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民俗遗产资源的挖掘,民俗遗产保护形式的选取,民俗遗产的传承与创新、开发与利用,民俗文化保护中的政府机制与民间机制,民俗文化保护中的专家作用等,进行了多视角、多维度、多侧面的考察和研究,既探讨了城市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形态与规律,又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城市发展过程中保护民间文化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就上海市民间文化保护的思路与对

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尽管他所给出的答案,也许只是多种选择中的一种,但他的研究和选择对保护工作和学术探求都是有益的。不久前,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冒昧地发表过一个意见:我们民俗学者要立足于回答当代提出的问题,而不要把民俗研究当成可把玩的玩意儿孤芳自赏。作为朋友和同行,我欣赏蔡丰明的这种学术探索,这种学术气度。

蔡丰明先生多年来研究上海民俗,成果累累,而今,他的新著《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当代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就要付梓了,他嘱我为这本新著写序,我不揣冒昧写了上面这些粗浅的意见,就算是对这本著作的祝贺吧。

刘锡诚

2009年4月10日于北京安外寓所

引 言

民俗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生活行为模式,是一种具有较长的历史传承性与族群认同性特点的文化形态,它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态度与审美情感。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民俗文化是其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地反映了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具有文化根基意义的民间文化传统特色。民间文化传统虽然在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中处于最为底层的层面,但它却会对各种上层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成为构筑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基础。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并把自己国家的民俗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列入整个国家的文化保护计划之中。在这方面最早形成较为自觉的理念,并且用立法的形式来对民俗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國家是日本。早在1950年5月,日本政府就颁布了一部专门针对国家文化遗产保护而设置的法律——《文化财保护法》,其内容中明确列出了“民俗文化财”一项,主要包括衣食住行、生产、信仰、年中节庆等风俗习惯、民俗艺能,以及与这些习惯、艺能相关的衣服、器具、房屋等等。这说明当时的日本政府对民俗文化的保护问题已经有了较为自觉的意识。正是在这种自觉的保护意识的影响以及国家法律的约束下,日本的民俗文化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一大批珍贵的民俗物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受日本的影响,韩国也较早就有了民俗文化保护的观念。该国政府在1962年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同样也把“民俗文化财”列入其中,并

对国内一大批民俗文化遗产实施了有效的保护措施。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愈演愈烈以及现代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98 年 10—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吸收了日本、韩国等国家有关无形文化与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了《人类口头及无形遗产代表作品宣言》,号召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地方社区采取行动,对那些认为是民间集体保管和记忆的口头及无形遗产进行管理、保存、保护和利用。所谓“人类口头与无形文化遗产”,即是指那些以语言、行为、习俗、技艺等形式进行传承与活动的文化遗产形式,英语为“Intangible Heritage”,又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2003 年 10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的第 32 届会议上,又形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的定义、内容以及保护的目与工作方法作出了明确的阐述。其内容主要包括:(1) 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 表演艺术;(3) 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 传统手工艺。^①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及其所涉及的范围可以看出,基于“人类口头与无形文化遗产”意义上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念,主要包含了“民间文化技艺”与“民间文化习俗”两大部分内容,这大致相当于日本《文化财保护法》中所提出的“无形文化财”与“民俗文化财”这两项内容的结合,它一方面将原来的民俗文化遗产保护概念包含其中,另一方面又扩大与拓展了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域。这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际上是一个比民俗文化遗产保护涵盖范围更广,包含内容更为丰富的文化遗产保护概念。从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 32 届会议(2003 年 10 月 17 日)通过。转引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50—251 页。

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标志着当今社会对于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不断提升与进步,同时也反映了当今社会对于人类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日益关注与重视。

虽然有关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已经日益深入人心,但是直至当前为止,人们还很少从“城市语境”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来探讨与研究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长期以来,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似乎成了一种乡村社会的“专利”,而作为人类社会形态中处于先进地位的城市,却往往在这方面处于“失语”与“缺位”的状态。在大量的有关城市学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很少能够看到有关“城市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成果,更缺少那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城市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话题的个案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大的遗憾。事实上,将民俗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到城市的语境之中来进行考察,从城市的角度与视野来分析研究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特点、形态与规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可以为当前的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大量的经验与思路,丰富与发展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具体内涵,而且也可以更好地延续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弘扬城市人文精神,有力地促进当代城市的文化建设。

把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话题纳入到城市的语境中进行考察,主要是想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1. 现代城市作为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中的一种先进形态,要不要进行民俗文化保护?如果要保护,那么它对于城市发展的价值及其有利之处主要表现在哪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城市发展之间似乎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矛盾关系。民俗文化作为一种一定的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生活行为模式,有着鲜明的传统性质,它们是各个历史时期生产方式与文化思想的反映,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传统文化”。

而现代城市却是一种主要以追求现代化为价值取向的社会生活空间,在经典的现代化理论看来,所谓现代化,就是指“产生于西方的,以 18 世纪为高峰的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部剧烈的社会变革”,自从现代化被西方提出来以后,它就几乎成了“发展”的同义词。既然现代化是一种“变革”、一种“发展”,那么它就势必要以扬弃传统,否定传统为标志,就要与传统文化进行“诀别”。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在当前的一些现代化大都市中提倡民俗文化保护似乎便成了一种“悖论”。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辩证统一的思维方法告诉我们,任何一对矛盾的双方都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现代城市追求现代化的价值取向虽然使它会与传统文化的保护之间产生一定矛盾,但是它又必须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必须在对传统民族文化进行合理的整合与利用的基础上才能提升与超越。要想实现城市的现代化,就必须尊重民族传统文化传统,弘扬民族文化精神,而不是彻底否定与摧毁它们。

2. 城市中如何进行民俗文化保护? 城市民俗文化保护的特点及其与乡村社会中民俗文化保护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哪里? 如果说城市中进行民俗文化保护是必要的,那么如何保护的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城市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出现的社会形态,在经济方式、社会机制、信息传播、生态环境等方面都与乡村社会有着很大区别,这就造成了城市语境中的民俗文化保护与乡村语境中的民俗文化保护在许多方面,如保护对象、保护方法、保护形式等等都会有所不同。由于城市社会中商品因素活跃,信息交通畅通,文化集聚程度较高,因此其民俗文化遗产资源往往存在着门类多样、混杂多元的特点,而不像乡村社会的民俗资源那样较为单一,同质度较高。由于城市社会中科技信息发达,文化创新能力较强,因此城市中的民俗文化保护方式大都体现了创新性、开拓性较强的特点,追求在保护中创新、在传承中利用等等的价值取向。由于城市社会中制度法规较为严密完善,社会组织机制较

为成熟有效,因此城市中的各项社会文化事业可以得到较为通畅有效的实施,同时也可使民俗文化的保护纳入到一个较为规范、科学的社会化程序之中进行运作。总之,城市民俗文化保护是一种充分体现城市的社会与文化特点,与乡村民俗文化保护有着显著区别的保护形式,当前,我们绝不能简单地运用一般的民俗文化保护法则去对城市民俗文化保护工作进行限制与统辖,而必须从各个城市的实际出发,结合各个城市自身的保护实践与经验,从中发现问题,寻求对策,这样才能真正探索出一条促进城市民俗文化保护事业科学、有效发展的道路。

3. 如何应对城市化带来的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破坏问题?其改善的措施是什么?现代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展及其引起的对传统文化的强烈冲击,致使大量的传统文化遗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这一事实致使许多人把城市发展看成为造成传统文化遭受灭顶之灾的罪魁祸首,把城市化过程完全放到了传统文化保护的对立面。正像有关学者所描述的:“城镇和城市化的步伐缩小并改变着民俗民风的聚集地,都市生活的霓虹使得传统艺人改行变当,无以为计。‘现代化’消融并拆解了民俗传统与现代艺术的界限,‘技术文明’使得我们的民俗文化失去了许多有形的物质载体和无形的技艺形式。民俗文化因其非官方性、非主流意识性,加之缺乏自身和外在的合理保护性,在‘技术文明’和传统文化的不断碰撞、交融和斗争中,成为现代‘技术文明’和文化全球化的自觉和不自觉的牺牲品。这当中,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因为其存在形式的单一性、存在载体的少变性、传承方式的特殊性等,面临着更为巨大的挑战,受到更为猛烈的冲击,不断走入困境和濒临消亡的境地。”^①然而实际上,城市化进程与保护传统文化之间

^① 叶春生《活化民俗遗产 使其永保于民间》,《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5期。

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城市发展也并不是一定要以摧毁传统文化为代价。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能够找到一些有效的措施,较好地改善城市化所带来的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的状况,促使城市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更好地保持与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相统一、相协调的关系。尤其是对于那些具有民间文化特性的民俗文化保护而言,如何通过一定的措施使民俗文化中的丰富价值与深厚内涵融入当代城市之中,促使传统的民俗文化遗产与当代的城市发展达到和谐统一,相互融合,成为当前城市民俗文化保护中的一个重要关键。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它们生动地体现了上海城市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单一走向多元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上海城市许多独特的人文特点与生活风貌。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在民俗文化的保护方面开始迈出了探索的步伐,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的蓬勃兴起,上海的民俗文化保护事业更是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2004—2007年的三年多时间中,上海已经挖掘出各类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1000余项,其中被列为国家级代表作名录的35项,市级代表作名录的83项,区县级代表作名录的204项,其他待申报项目500多项,出版有关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各种专著、资料集、调查报告等文献1000多种。^①上海社区已建立了200多支普查队伍,在部分社区中,还创办了专门的学校与各种培训班,对一些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南汇锣鼓书、青浦田山歌、松江顾绣等进行教学与传承。由此可见,上海作为一个经济文化发达,科学技术先进的大城市,正在通过各种方式与途径,探索着自

^① 参见《上海市第一、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上海市第一、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等资料。

已在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道路,它不但证明了现代城市可以与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相互统一,和谐兼容,而且也现代城市如何更好地保护传统文化开拓了思路,提供了经验。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全面考察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与现状,深入分析当前上海城市民俗文化保护的不足与问题,明确提出今后上海城市民俗文化保护的思路与对策,不但能够更好地推动上海城市民俗文化保护工作的开展,而且也能够更好地探索现代城市在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上的特点与规律,为“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这一话题提供若干有效的方法与思路。

目 录

序	刘锡诚(1)
引 言	(1)
第一章 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对当代城市发展的重要价值与 独特意义	
1 延续城市文化传统,增强城市文化认同	(1)
2 构建城市和谐生态环境,维护城市文化多样性	(3)
3 塑造城市自身文化形象,彰显城市鲜明文化个性	(6)
4 推动城市文化产业发展,创造城市经济社会效益	(8)
第二章 上海城市化过程及其民俗文化资源的主要特征	
(10)	
1 上海城市化过程及其文化发展概况	(10)
2 上海民俗文化资源的主要特征	(14)
3 城市化过程所带来的资源濒危状况以及保护的迫 切性	(18)
第三章 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及其主要模式	
(22)	
1 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过程及其特点	

与优势	(22)
2 当代上海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模式	(25)
3 存在问题与改善措施	(32)
第四章 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	(34)
1 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的传承机制及主要形式	(34)
2 传承人的濒危状况与保护措施	(41)
3 民俗传承中的创新发展及其具体表现	(46)
第五章 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	(52)
1 民俗遗产保护与民俗资源开发利用的关系	(52)
2 当代上海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形式	(54)
3 民俗文化开发中的问题及改善措施	(64)
第六章 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作用及其 运作机制	(68)
1 政府在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	(68)
2 上海地方政府在民俗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运作机制	(71)
3 当前上海政府保护机制的完善与提高	(76)
第七章 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民间力量及其 运作机制	(79)
1 城市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的多元性	(79)
2 上海社团组织与企业在民俗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	